

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述论

傅义强*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陆新移民大量涌入欧洲, 尤其是欧盟国家 (本文专指前欧盟 15 国), 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洲以来, 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 分布最广泛的一次移民潮, 显示出与以往欧洲的华侨华人移民不同的特点与规律。由于新移民的增加, 给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 成为欧洲华侨华人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 欧盟国家; 中国大陆; 新移民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08) 03-0050-09

一、中国改革开放前华人移民欧洲的历史

华人移居欧洲的历史悠久, 古代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 中国人就跨越西伯利亚地区而与欧洲诸多民族之间曾经保持着长期的人员及物质交流, 期间就有中国人经西伯利亚而移居欧洲, 尤其是东欧地区。13 世纪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 客观上促进欧洲交通空前通畅, 常发生欧亚民族双向移居的现象。16-18 世纪,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中国与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了经济与文化交流。在此大背景下, 开始有中国人远渡重洋, 进入欧洲并留居欧洲数年乃至数十年。然而, 中国古代移居欧洲的人数与规模都较小, 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移民。

真正意义上华人作为移民族群生活于欧洲, 并引起当地主流社会关注, 是始于近代, 迄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40 年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 当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 中国人进入欧洲的移民构成及其地位也随之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19 世纪初至 1945 年前, 华人移民欧洲主要有两股潮流, 一是许多人赴欧洲作为契约劳工, 其形式类似于半个世纪前在东南亚、南非和北美的苦力贸易。所不同的是, 他们是以“船员”的身份被招募到欧洲的诸多船务公司, 从事远洋货轮的水手。在欧洲的各大港口城市如伦敦、利物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汉堡、安特卫普, 到处都有不少来自中国广东的海员替欧洲船运公司卸货并等候轮船公司续订雇佣合同, 这打破了欧洲海员的垄断地位, 有好些欧洲轮船公司曾经利用这些中国船员来削弱欧洲海员工会组织的影响力。1917 年俄国革命之前, 沙皇俄国曾大批利用中国劳工为其修建连接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中国的契约劳工为远东俄罗斯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欧洲在中国大批招募劳工入欧, 是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 为补充大战造成的劳力匮乏, 协约国方面在山东、上海和浙江雇佣了 10 万劳工 (也有人认为是 20 万) (Frank N. Pieke, 2002)。在欧洲发生的多次战争中, 中国的契约劳工也有的自愿参战, 或受雇参战。1917 年后留居俄国的中国劳工, 还帮助布尔什维克与白军作战。大战结束、合同期满后, 绝大多数劳工

* [收稿日期] 2008-03-24

[作者简介] 傅义强, 男,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回国，但也有少部分留在了欧洲。另一股移民欧洲的潮流是来自浙江南部的小商贩，也有少量来自山东的小商贩，经过陆路到莫斯科和柏林，又穿过大海到达马赛和巴黎。然后，从那里分散到整个欧洲大陆。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华人移民才开始作为一个异族社会小群体若隐若现于欧洲社会中，尽管留居欧洲的华人移民人数仍然有限，但以广东海员和浙江小贩为中心的中国移民群体毕竟已初现雏形，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逐渐加速发展起来。受国内赴欧洲“勤工俭学”热潮的影响，欧洲各国也出现了以求学始、移居终的中国留学生。据 30 年代初的统计，全欧华人约在 4 万人左右(李明欢, 2002a)。这些进入欧洲本土谋生的中国人，生活境况是低下的，长期受到欧洲社会的歧视与排斥。此后，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那些中国移民一度陷入困境，但在战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快改善了。随着战后西欧经济的复苏，这些战前移民与家乡的亲属和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移民链”，使得他们的亲戚、同乡纷纷借亲缘关系来到欧洲，产生“连锁移民”的现象，这与半个世纪前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情形非常相似。

在二战后，国际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东西方阵营形成。在这一背景下，华人移民欧洲最为突出的是大批香港新界的移民和少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而中国大陆的移民迁移则停止了。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浙江、广东家庭移民欧洲变得非常困难。而西欧战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先期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趁机获得了向东拓展到西欧大陆的空间。20 世纪 50-60 年代在英国的“联邦理想”的影响下，大批香港新界人移居英国，成为英国华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以中餐业为支柱的英国华侨经济模式。此后短短数年，这一经济模式也迅速辐射到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欧洲各国。香港移民成为欧盟各国快速发展起来的餐饮业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最多是在英国，其次是在荷兰、比利时，然后是德国和北欧诸国，在法国和南欧现在也有相当的数量。时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欧洲华侨华人群体已增加到大约 6 万人(李明欢, 2002b)。

20 世纪 70 年代大批进入西欧的华人移民潮，主要来自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东南亚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的新体制下出现的经济、政治动乱，印度支那的政治事变，使数十万印支难民涌入西欧。西欧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了“印支难民”，越南难民多集中在法国，而印尼难民则集中在荷兰，在印支难民中华裔移民约有 12-15 万人(李明欢, 2002a)。由于该群体的总人数几乎相当于此前西欧华人群体人口的两倍以上，故而促使西欧华人社会的人口、经济、文化构成等随即发生重大变化，西欧华人的地缘结构发生突变。

从上述华人移民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欧洲的华人主要有广东人、浙江人、香港人和东南亚华裔难民。早期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广东人和浙江人。二战后，欧洲的中国大陆移民减少，香港人蜂拥而来，他们的“英联邦公民”的身份以及经营的中餐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他们成为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中心，因为同属于粤语方言，广东人也居于华人群体的中心，并常混迹于香港人之中。东南亚华裔虽然进入欧洲时间较晚，但是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来自所在国的殖民地，会各种语言，所以他们在香港人经营的中餐馆受雇佣的机会较大，发展较快。然而，他们身份复杂，在华人群体中往往以中国祖籍地为纽带，称自己是潮州人、客家人或是闽南人等，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们的群体属性。总体上看，欧洲的华侨华人社会与同期东南亚或美洲华人社会相比，规模有限，人数很少，多从事餐馆业、手工业及小商贩，没有产生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华裔或华人企业家。这说明欧洲的华人移民多为非精英移民。

二、改革开放以来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潮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华人移民欧洲最为突出的一支是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伴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出人意料地为中国人由东向西迁移铺就了坦途，“出国热”在神州大地上骤然兴起，中国跨境移民潮以超乎任何人想象的速度高涨，欧洲成为中国当代新移民追寻发展的一大重要舞台。欧洲的大陆新移民来势之猛，发展之快，卷入人数之多，后续影响之广，使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空前巨变。与此同时，西欧已完成了对印支难民的接收，在1975年越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印支难民流消退，因此华裔难民的流入基本停止。香港人在西欧经营的中餐馆也渐于饱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东南亚各国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正处于经济低迷时期的西欧的差距，因此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移民对西欧的经济上的动机削减了。于是，中国大陆新移民就更为凸显出来。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欧各国相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有极少一部分大陆移民被准予离开中国大陆，以“家庭团聚”为由前往西欧各国。一度被中断的欧洲的中国大陆移民流又开始了。这小股潮流只是二战前移民方式的回归，当时大陆的海外华人家庭被指定住于侨乡，主要位于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他们几乎在国外都有十分过硬的“亲属关系”，前往欧洲的主要是浙江和广东的家庭团聚移民。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冲击，尤其是1985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申请出国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提供海外人士的邀请信的，无论男女，就可以申请出国护照。该法的实施使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大陆新移民体制出现了，其结果就象是新鲜血液注入欧洲和北美的海外华人社会，引起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化，格外令人关注。

在欧洲，中国新移民主要是来自传统侨乡的浙江南部温州、青田地区，它们有移民欧洲历史的传统。最初，浙江人是以典型的“移民链”的方式进入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并且依靠亲缘乡缘网络很快就可以解决食宿问题，开始打工赚钱的“新生活”。之后，浙江移民为寻找商机和进一步发展，开始脱离固有的圈子，再次在欧洲境内流动，先是到达了北欧诸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90年东欧巨变前后，他们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一部分人又转入了前社会主义的中东欧国家创业，也有部分人直接从中国老家远赴东欧。可见，这时的浙江移民发生变化，开始成为全球性的移民，不再谋求固定一地生存，而是不断地从西欧扩展到北欧、南欧及中、东欧创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人在英国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香港移民，因此在英国没有发现多少浙江人的身影。

在欧洲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福建省的福州、福清地区，它们有移民的传统，但是没有赴欧洲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传统侨乡，如福建的三明、明溪地区，它们没有一点海外移民的历史传统。对于前者来说，它有一百多年的移民东南亚的历史，东南亚的华裔向西欧的再移民对于福州地区也产生了影响，一些福州地区的移民通过这一“移民链”到了欧洲，他们寄回的汇款以及传来的消息又进一步引发新一轮的向欧洲的移民潮。对于后者来说，尽管它们处于福建北部山区，没有移民传统，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有许多人因各种原因从传统侨乡移居明溪，其中就有来自福建侨乡和浙江温州的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移民潮”的影响下出国，开始并没有像其他移民一样依赖于亲属网络来确定目的地，而是根据在途中听到的信息改变迁移方向，并最终选择了欧洲。这与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有很大关联。由此，明溪移民的“雪球”开始滚动，明溪“新侨乡”开始产生，以至于成为今天的“旅欧第一县”。可以看出，与浙江移民相比，欧洲的福建移民与移民传统已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是全球化的产物，他们移民欧洲与移民北美、日本、澳大利亚一样都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尽管方向不同，然而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财富。正如牛津大学的彭轲教授所说，“福建移民到欧洲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尽可能的努力干活挣钱”(Frank N. Pieke, 2002)。福建人在世界各地的数量激剧增加，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劳动力不可避免地融入世

界劳动力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过程。

在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还有说粤语的广东人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留学生。广东人与香港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移民方式多为家庭团聚，并不具有新移民的典型特性。广东人因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了起来，许多人将子女送出国留学，作为一种投资。因此，留学生成为改革开放后一种新的移民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派的留学生，数量较少，一般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年龄较大、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学成后基本上都回国了，很少有滞留不归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逐渐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学成后没有回国，在当地获得了长久居留权。然而对于欧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来说，尽管这些年英、法、德等国为增加财源招收外国留学生，使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逐年增加，估计有 10 万人，已超过了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的留学生，成为欧洲中国留学生人员的主体，但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为数不多，估计有 2 万多人，这在欧洲华侨华人中占很小的比例（赵红英，2001）。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对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求职及居留方面均有种种严格限制，欧洲的留学生从“学生居留”转为“工作居留”相对困难，特别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长久的位置很不容易，因此中国大陆留学生学成后或是回国或是赴第三国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谋发展。可见，欧洲的大陆新移民中缺乏精英，主要以非精英移民为主，这与一些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有很大关系。

总体而言，在吸引和资助渴望到西方留学的中国学生方面，欧盟各国都不如美国，一般大陆真正优秀的精英人才都首选美国，而选择欧洲的有许多是家庭较为富有但成绩一般，没有考取国内大学的学生。而欧盟一些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广泛招收中国大陆留学生，在英、法、荷、德等国，还出现了一些以招收留学生为名，实则谋取不义之财的所谓“学校”，这使得一些并非真正优秀的大陆留学生来到欧盟各国，然而受到欧盟各国严格的工作许可的限制，他们往往选择在中餐馆“打黑工”挣钱，成为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新移民中还有许多人把自费留学看成是一种进入欧洲的“捷径”，因为相对来说，到欧洲留学比其他途径如家庭团聚、政治避难以及非法进入更为便捷安全，例如有许多来自浙江温州的孩子，把留学当成是移民欧洲的手段，他们拿到学生签证进入欧盟各国，日后便想方设法居留下来。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下海”商人、“下岗”工人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为了寻找商机和发展机会，也将目标转向国外。而此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给他们提供了契机进入中、东欧，并在那里办公司、开工厂、开商店、摆地摊或是卖手艺及体力，这使他们迅速成为当地经济的一个基本部分。这当中有许多人又从中、东欧进入欧盟各国，当然也有一些东北、山东城镇的移民直接进入欧盟国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呈现了如下特点：

1、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与以往的移民相比，新移民很少带有被动的因素，更多的是主动、自愿的选择，其目的与其他跨国移民一样是为了更好谋求生存与发展机会，它的移民方向虽然与华人移民欧洲的传统有着相关的联系，然而这种关联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全球化下的国际移民趋势。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具有当代国际移民的重要特征，他们不再单独移往一个特殊的国家，局限于西欧的英、法、荷等主要国家，而是以此为中心向整个欧盟范围扩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比、奥和北欧诸国扩展，80 年代又进入南欧，90 年代则扩展至东欧。这种不断的跨国迁移流动，以四海为家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体现。

2、早期欧洲华人移民以及欧盟各国移民政策中以“家庭团聚”、“劳工申请”为合法移民的主渠道，决定了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鲜有特殊专业才能、携带雄厚资本或社会名流的“精英移

民”，而是以“非精英移民”为主，包括数量较大的非法移民。在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除一小部分学成后留在当地的留学生外，估计85%以上均属“非精英移民”(李明欢, 2002a)，以来自农村及中小镇的青壮年为主，其总体知识结构及移民前的财力结构均远远不如北美大陆新移民群体。

3、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其涉及的社会背景也越来越宽泛。除了与历史上欧洲华人移民有渊源的浙江人、广东人外，还出现了几乎没有历史渊源的福建人，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商人和“下岗”的剩余劳动力，女性的移民数量也不断增加。近年来，从中国东北移民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人数也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这些移民所牵涉的社会背景以及迁移动机和方式复杂多样，并且经常变化，移民类别也常从一种方式向另一方式转换。

4、中国大陆新移民使欧洲原有的华侨华人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英国的华人社会虽然占主导地位仍是香港人，但是福建大量的非法移民的存在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法国，华人社会来自印度支那的强大的华人移民群为主体，然而浙江移民群体的势力却在不断增长。荷兰则类似于华人移民的交汇点，华人社会包括广东人、浙江人、东南亚华人，苏里南人以及迅速增长的福建人。在南欧的意大利等国，则几乎是大陆新移民聚集地，浙江人和福建人占据华人社会的中心。浙江和福建新移民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越来越显著。

三、欧盟国家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构成及现状分析

目前，关于欧盟的大陆新移民的规模和数量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由于欧盟涉及的国家较多，中国大陆新移民流动性较强且大量存在非法移民，又极易与老华侨华人及港澳台、东南亚华人移民混淆，因此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难以统计，既有一些数据相当不完整且准确率极低，甚至不同的统计结果数据相差很远。因此，对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规模和数量我们只能参考已有的统计结果，做出大致的推断。

据欧洲一份颇有影响的华语报纸报道，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移居欧洲的华人累计260万人，其中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增的新移民接近80万人。该报道特别指出这个数字不包括非法移民和留学生(刑世嘉, 2005)。这

表1 欧洲主要国家华侨华人统计(1955-1997) 单位: 人

国家	1955年	1965年	1975年	1985年	1995年	1997年
英国	3000	45000	120000	230000	250000	250000
法国	2000	6000	90000	210000	200000	300000
荷兰	2000	2353	30000	60000	120000	100000
德国	500	1200	8000	30000	100000	110000
比利时	99	565	2000	11400	20000	30000
意大利	330	700	1000	5000	60000	100000
西班牙	132	336	2000	5000	21000	30000
奥地利	30		1000	6000	12000	20000
葡萄牙	120	176	300	6800	4700	5000
丹麦	900		1000	3753	6500	6000
卢森堡	1	10	20	200	100	
瑞士	30	120	1500	6000	7500	
希腊	2	16	10	130	300	
爱尔兰					10000	
瑞典			1000	9000	12000	
挪威			500	1000	2000	
芬兰					1000	
波兰					1500	
捷克					10000	
匈牙利					20000	15000
独联体(前苏联)					200000	
总计	11491	56476	258330	584283	1058600	966000

资料来源: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M]. 华侨出版社, 2002年版, 第830页

一数据与学者李明欢的统计相差较远，据她统计，欧洲华侨华人在1995年约有105万多人，1997年有96万多人（参见表1），并估计1976-2000年，中国大陆移居西欧国家的新移民约在30-35万之间（李明欢，2002a）。她没有说明这一数字是否包括非法移民，不过从她统计资料的来源看似并不包含。

欧洲统计局（Eurostat）也统计了20世纪90年代欧盟国家的华人人数，因为它不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移民，因此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统计，然而它得出的统计数据却是极低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陆新移民在欧盟15国最多的时候达到18万多人（见表2）。这一数据是是相当不完整的，它没有卢森堡、奥地利和爱尔兰的任何数据，法国的数据是1990年的，许多国家的数据只有少数的几年，而且很明显它没有统计中国非法移民的情况，因此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实际数据要大得多。不过，如果加上在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非法移民，可以大致估计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据报道，目前在意大利的中国非法移民约10万，在英国约有10万，在法国约有6万。这样估计，大致在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约为50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另一学者章志诚的统计相近，据他统计，1979-2000年，西、意、奥、德、荷、比、法、葡等国的新移民（包括港台）约有50万人，但因为并没有将香港移民最为集中的英国统计在内，所以应当认为这50万人中基本是大陆新移民（章志诚，2002）。我们也可从欧洲华侨华人的数量变化看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规模。1970年欧洲的华侨华人约为11.2万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198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就增至62.2万人（高伟浓，2003）。在表1中，1975年欧洲华侨华人有25万多人，到1995年就达到105万多人，增加了80万人。由此可以推断，欧洲的大陆新移民至少有50万人。可见，中国大陆新移民在欧盟国家增长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多年就占欧洲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令人注目。

进入欧盟国家的新移民随着他们的不断迁移流动，其分布也是不断变化的，从西欧向北欧、南欧扩展，再到东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也调整了其移民政策，对大陆新移民进行限制，新移民又纷纷从东欧转入南欧和西欧。因此，目前中国大陆新移民多集中于西欧与南欧各国，从表1、表2中均可以看出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不仅是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大陆新移

表2 欧盟国家15国近年来华人数量（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单位：人

国家	1990年	1995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最大数
德国	-	32316	40156	42230	38726	42925	42925
法国	14051	-	-	-	-	-	14051
英国	21000	-	23000	-	20983	-	26000
荷兰	6163	8185	7855	7830	8175	8188	8701
爱尔兰	-	-	-	-	-	-	-
意大利	8531	17629	26298	-	-	48650	48650
西班牙	-	8713	11446	16273	20690	-	20690
葡萄牙	1102	1981	2380	2482	2796	3033	3033
希腊	-	454	566	669	-	-	669
比利时	2168	3852	3952	3891	-	-	3952
卢森堡	-	-	-	-	-	-	-
奥地利	-	-	-	-	-	-	3537
丹麦	-	1536	1911	2136	2266	-	2266
芬兰	-	1293	1485	1623	1666	1677	1677
瑞典	1414	3421	3659	3760	4025	4322	4322
总计	54429	79380	122708	80894	99327	108795	180473

资料来源：Eurostat database THEME3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整理自 Frank N. Pieke,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Switzerland: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2002, Vol.6, p.52.

http://www.boeco.com/boeco/newshtml/2005/0327/2005032712955_0.htm; <http://inter.qianlong.com/4319/2004/03/30/1500@1972166.htm>

民最多的国家。据欧洲统计局统计, 1995年进入德国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有5464人, 1997年为7785人; 1997年进入意大利的有7297人; 1998年进入英国的有5779人, 法国为5464人, 荷兰为1608人, 西班牙为1007人。这些国家的大陆新移民远远高于其他欧盟国家 (Frank N. Pieke, 2002)。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赴欧盟国家的大陆移民基本上是家庭团聚移民,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有过硬“海外”关系的人要么已经移民要么还不想移民, 因此想要出国的人大多不具备合法移居的条件, 于是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出国, 这进一步促进了移民网络的建立以及移民普遍化、专业化的形成。在中国大城市最时兴的办法就是“自费留学”, 在乡村则有移民三部曲: 最早是先期出国的移民出于情面“帮助”乡里乡亲出国, 接着是“熟人”之间的“有偿互助”, 最后则发展到以组织偷渡牟取暴利为目的的“蛇头”或曰“包头”直接介入移民操作, 纯粹在利益层面上编织的移民网络应运而生(李明欢, 2002a)。因此, 在欧盟国家, 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类别多样, 有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移民、劳工移民、申请避难者及非法移民, 这些类别之间常常互相转化。大陆新移民以家庭团聚、留学为由的方式到了欧盟各国后, 就可能转化为餐馆劳工或因超期滞留而超出了合法的范畴, 成为非法移民; 而避难申请者也有可能获得批准, 非法移民也会因大赦而取得合法身份, 又会引发新的家庭团聚移民。因此, 欧盟大陆新移民的类别存在诸多模糊混淆之处, 不确定因素较多, 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学者高伟浓曾认为欧盟的每一种外来移民类别都存在合法与非法两种途径和可能性, 移民类别/结构非均衡性很明显, 例如家庭移民类型就是合法形式为主, 非法形式非常罕见, 而难民类型则以非法移民为主, 合法形式很少(高伟浓, 2003)。这也同样适用于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在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 非法移民是合法移民的“衍生物”。他们这些人通常与合法移民是同一地区和同一村庄的, 他们是沿着合法移民的足迹进来的。近年来, 欧盟国家中国非法移民比例节节上升, 前面已述目前英国、意大利、法国三国就有中国大陆非法移民约26万人, 可见占欧盟大陆新移民一半左右。在欧盟, 中国非法移民中真正属难民的比例越来越小, 多数是以赚钱为目的的非法劳工(黑工), 但是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又以假难民身份出现, 为了取得身份合法化, 他们往往以受到国内计划生育、宗教迫害为由提出政治避难。总之, 中国非法移民的身份也相当模糊。一般来说, 中国非法移民有非法滞留、持假证入境和偷渡等几种方式。非法滞留往往以某种合法资格如留学、探亲、旅游等进入欧盟国家, 其踏出国门的第一步基本是合法的, 到了国外后则逾期滞留或再度无证越境, 成为非法移民。福建北部山区的明溪县移民往往采用这种方式进入欧盟国家(李明欢等, 2003)。持假证入境是一些移民往往出大价钱从他人手里购买假的护照签证, 以此减少移民风险, 增加入境的保险系数, 但每次的人数不是很多。非法滞留与持假证入境都往往是个体进行的, 具有分散性, 而偷渡则是有组织有规模地偷越国境, 往往是称之为“人蛇”的数十甚至数百移民在“蛇头”集团的组织下被运送出国。偷渡到欧盟国家的路线基本上有陆路和水路两条, 前者取道前苏联地区, 再经南斯拉夫登陆意大利等“申根协定”成员国; 后者则从海上出发, 渡过南海、印度洋和地中海, 途经意大利来法, 或是直接在马赛港上岸。一般来说, 福建福州和浙江温州地区的非法移民因靠海岸线较近, 通常采取偷渡的方式, 近年来, 来自东北城镇的非法移民也多通过陆路偷渡进入欧盟各国。

以非精英移民为主体的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中国大陆新移民适应了欧盟国家华族经济的发展要求, 欧盟国家的华族经济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大陆新移民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欧盟国家华族经济的发展, 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也为之改观。在欧盟国家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华人聚居区生长起来的华人经济一直以来处于主流经济的边缘, 其基础一部分是华人移民内部以家庭为单位(有时是朋友间的合伙)的自我雇佣, 一部分是低工资水平下的本族群

之间的雇佣。中餐业是传统经营的行业，也是欧洲华族经济的支柱产生，这一行业以低技术与高工作强度为特征，因此特别适用于大陆的非精英移民（高芸，2004）。正是如此，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新移民人数增加较快的国家里，中餐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不少大陆新移民还经营皮革业和制衣业。此外，有许多新移民靠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给他们提供的有利机遇，利用中国商品价格的优势，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与进口贸易。

中国大陆新移民促进了欧洲华人经济的多元化，也使华人社区出现变化。例如在法国巴黎，第三区和美丽城已发展成为温州商业街。新移民拓展了原有的华人社区，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目前大陆的非法移民为了寻找工作机会和躲避搜捕，还有朝各国小城镇渗透的趋势。

在欧盟各国，中国大陆新移民已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新移民为主的各种社团迅速发展起来，这当中有区域性社团，主要包括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是全欧洲性的社团，如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奥地利华人总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等等，它们多是新移民发起筹建的。新移民还建有各类同乡会，在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会同乡会组织比较普遍。新移民行业社团中种类商会和中餐业的同业组织占多数，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全德华商联合会、西班牙华商联合会、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商贸易联合会、奥地利中华工商联合会等。此外，新移民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中文学学校或中文补习班，同时还创办中文报刊，例如法国的《欧洲日报》、荷兰的《华侨通讯》、比利时的《比中侨声》、西班牙的《西华之声》、意大利的《南欧华人报》等报刊几乎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

然而，在欧盟诸国，华侨华人社会相对分散在各个国家，而且由于华人构成较为复杂，华人血缘、地缘、方言等不同因素是华人社团组建的基础，因此有不少代表华人社群整体的社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时常发挥作用的往往是以核心群体为基础的小社团如同乡会，它们相对独立，但是当欧盟各国政治、经济或社会环境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这些小社团之间又会互相联系，并且在大的华人整体社团的组织下采取行动，而这种一致行动有时又会造成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整体团结一致的假象，从而掩盖在欧盟国家内部华侨华人社会相对分散的事实。

总体来看，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主要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生存与发展，他们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华侨华人社会的力量。然而，新移民经济主要是面向华人群体内部的消费市场，尽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得很快，但其规模多限于华人社会，因而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且技术含量低，靠增加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提高企业效益和竞争力，产品以中低档为主，更缺乏著名的品牌。大陆新移民也很少与非中国人竞争工作机会，他们大多缺乏进入欧盟国家其它行业与竞争工作职位的能力，因而只能在华人经济领域内谋求发展。当某一地区华人经济发展出现饱和时，新移民就会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去寻找机会，这就导致新移民持续不断的迁移。也正因此，华族经济始终处于欧盟各国经济的边缘地位，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华人经济的族群意识，这对保护保护华人利益和团结华人群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由于内部竞争激烈，也影响了华人内部团结。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即由于将自己完全定位于族群，便给欧盟国家的种族歧视留下了余地，这也影响了新移民融入欧盟国家中。

[参考文献]

- [1] Frank N. Pieke,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Switzerland: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J], 2002(6).
- [2] 张振江. 早期香港华人流出地试析[J]. 南方人口, 2008(1).
- [3]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M].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 [4]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述评[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4).

- [5] 孟庆梓.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文化变迁——基于福建沿海J村的调查分析[J]. 南方人口, 2008(1).
- [6] 赵红英. 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J]. 八桂侨刊, 2001(3).
- [7] 邢世嘉. 寻梦欧罗巴——新一代欧洲华人生存报[J]. 华人时刊, 2005(11).
- [8] 章志诚. 关于欧洲新移民问题的探讨[J]. 八桂侨刊, 2002(1).
- [9] 鲍思顿, 毛信翔, 于美渝. 当今海外华人的分布[J]. 中国人口科学, 1995(1).
- [10] 高伟浓. 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M].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 [11] 李明欢, 江宏真, 俞云平.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4).
- [12] 高芸. 中国移民与欧洲的强迫劳动(中文版)[M]. 日内瓦国际移民组织, 2004.
- [13] 赵红英. 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 北美与欧洲的比较[J]. 八桂侨刊, 2001(3).
- [14] 王春光. 巴黎的温州人[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15] 王苍柏. 跨境人口问题及政策意义——基于香港的分析[J]. 南方人口, 2007(4).
- [16] 张桂霞. 加拿大中国移民概况及发展态势[J]. 南方人口, 2007(1).
- [17] 黄润龙. 中国移民在加拿大[J]. 南方人口, 1999(2).

Overview of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ese Mainland in EU Countries

Fu Yi-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in 1978,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from Mainland have emigrated to Europe, especially to EU countries (here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former 15 EU countries), and formed an unprecedented tide of Chinese emigration with the largest size, the longest period of time and wide distribution in most EU countr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Europe. However this new tide of immigration into EU boast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Chinese emigration to Europe.

Key words: EU countries;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nts